

伊斯兰 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Islam and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f China

姚继德 马健雄 主编

Edited by Jide YAO & Jianxiong MA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姚继德，云南省楚雄市人，回族，民族学博士，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康州费尔菲尔德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美联基金会-弗里曼基金会年度研究员，印度班加罗尔基督教大学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历史人类学中心访问学者。从事伊斯兰教、中国-中东关系史、伊朗学、郑和下西洋、民族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和教学。历任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现任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兼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出版论著、编著、译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译）文100余篇。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伊朗友好协会理事，伊朗比赫什迪大学和穆斯塔法国际大学客座教授。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Hong Kong SAR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Areas of Excellenc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伊斯兰

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Islam and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f China

姚继德 马健雄 主编

Edited by Jide YAO & Jianxiong MA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 姚继德, 马健雄主编.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82-3175-2

I. ①伊… II. ①姚… ②马… III. ①伊斯兰教—关系—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B968②D6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5233号

责任编辑: 石 可
装帧设计: 刘 雨

伊斯兰

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

Islam and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f China

姚继德 马健雄 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理焜教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175-2

定 价: 68.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5148757。

前言

姚继德

本书系2015年1月10日至12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下，由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联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云贵高原的穆斯林社群与东南亚的联系学术研讨会”内地参会学者的论文选集。出席本次会议的学者，是分别来自云南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山东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等单位长期从事中国伊斯兰与穆斯林历史文化研究的18位学者。他们中既有高校科研院所的学院派学者，也有在云贵两省回族草根社会耕耘多年成果丰硕的民间专家。因此，会议开创了学院派学者与民间学者同会交流切磋之先河，显示出香港学术界唯学术品位是求，而不存丝毫学术畛域的平等、自由而博大的氛围。在三天的研讨会中，学院派学者的理论洞见与乡土学者的草根感悟，相得益彰，热烈而专业的学术切磋与前往湾仔陈东里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等回族社群的“田野考察”紧密结合，真正体现出历史人类学独特的学术风格。难能可贵的是，会议期间，学者们不分长幼，或演讲，或点评，皆见仁见智，互有智慧的启迪，形成了经济人类学中所倡导的“互惠性”效应，这亦成为本次研讨会之最大特色。

从学理上看，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着重于对某个特定区域里普通民众或族群日常社会生活的研究，社会亚文化（或称俗文化）是其研究的重心。它通常采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所共同使用的田野调查法（Fieldwork），从各族群的民间草根社会广泛获取被传统史学所忽略的民间档案、宗族谱牒、原始记录、口述史料、考古发现等资料，从“小社会”（区域社会、族群社会）或“小传统”的微观视角，以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和社会史等多学科交叉的相关理论做指导，鼓励学者们深入考察、审视和补

充所谓的“正统史学”所记录的“大社会”及“大传统”，从而可有效矫正“正统”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固有偏见。

本次会议根据既定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视角下的“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围绕“云贵高原的穆斯林社群及其与东南亚的联系”主题，展开了专业性的集中研讨，达到了会议主办各方的预期学术目标。

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贵州两省，是中国回族穆斯林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回族先民自公元13世纪的元初大量进入该地区以来，历经700余年的繁衍发展与社会交融，已然成为该区域内人口较多、分布较广、集伊斯兰与儒家文化为一体的文化程度较高、商品经济活动最具活力的一个穆斯林社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中，西南边疆多样化的回族社群及其代表人物一直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如元代的云南行省在中亚布哈拉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治理下，中国西南与毗邻的东南亚中南半岛社会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联系；明代的云南在回族政治家西平侯黔宁王沐英（1344—1392）及其家族的经营治理之下，在元代赛典赤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巩固了云南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而明初的云南回族穆斯林航海家、和平外交家郑和（1371—1433）七下西洋的远航壮举，不仅把海上丝绸之路网络拓展到了极致，而且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曲绝唱，郑和七下西洋开创并巩固下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网络，成为了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继承的国家遗产，其历史价值，功在当代，泽被千秋。明清时期肇基的中国伊斯兰教云南学派，经师辈出，人才荟萃，集陕西学派、金陵学派和山东学派之大成，在马注（1640—1711）、马德新（1794—1874）、马联元（1841—1903）等著名伊斯兰经师推动下开展的西南地区伊斯兰教本土化运动，持续长达三百余年，重塑了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路径。清代以来，云南回族社群建立的商贸和马帮交通网络，在滇南、滇西、滇东北、黔西北矿区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之间，以及在云贵两地与西藏和中南半岛之间，都建立起了广阔的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网络。西南地区的回族社群及其马帮商队，借助古老的“蜀身毒道”（后来的西南丝绸之路）交通网络的地利之便，不仅架起了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同时也使西南地区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广袤区域内不同民族经济文化交汇的黄金地带。其中，在云贵高原山脉纵横相对封闭的独特地理环境下，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也与文化多样的穆斯林社群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将不同社群之间的民间网络化联系和宗教影响力持续向东南亚、西藏和长江沿岸扩展。许多伊斯兰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例如该区域内回族

社会流行的修纂汉文回族家谱，建立经堂教育体系，融通回儒知识，开展回（伊斯兰，Islam）耶（基督教，Christianity）文明对话，借道东南亚和南亚的交通便利远赴西亚阿拉伯半岛麦加朝觐游学等等，莫不与以云南回族社会为文化圈核心的地方化的伊斯兰宗教实践相配合，同时也构建起以多样化突出特征的西南边疆回族社群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回族穆斯林社群以其极具地方特色的社会能动性（Social Agency），从元代迄至今日，都积极参与了整个中国回族在宗教学术、宗教实践、族群认同与族群建构的历史过程，并在沟通该区域内不同族群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联系中，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为此，本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分布于云贵两省的回族社群在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与社会网络联系中的多样性、中介性角色的建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地方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集中考察回族社群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化多样性与地方化策略同伊斯兰教的关系，回族社群所共享的宗教与商业网络联系及其内在的能动性，如何从整体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和西藏之间的联系等。

本书选编了出席会议的内地学者的13篇会议论文，围绕“云贵高原的穆斯林社群及其与东南亚的联系”这一主题，集中展示了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的风貌。内容涉及中外民族学界近年来持续关注历史上迁徙到东南亚中南半岛缅甸、泰国的云南回族的两大境外派生族群“潘泰人”（Panthay）与“秦和人”（Cin-Ho Muslim）的移民历史，云南回民清末反清起义失败后跨境进入缅甸佤邦建立的最大难民基地班弄（邦隆 Panglong）的自述史，他们在境外缅甸泰两国的社会变迁及其身份认同，云南边疆多民族社会环境中派生的“白回”“藏回”穆斯林群体的成因与现状，村落与家族史视角下的清末大理地区回族社会的变革，清中期滇西失业矿工和地方团练崛起与清末云南回民反清起义爆发之间紧密的历史关联，滇南回族社会民间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历史转型及其现代意义，省会昆明市区回族社会自元迄今700余年中的人口变迁及其规律，昆明市著名回族社区顺城街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重构，大理地区回族餐饮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网络特色，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回族教育文化的演变及其成就，以及颇具地域特色的黔西北与滇东北昭（通）威（宁）鲁（甸）乌蒙山地区回族族谱文化等命题，大家都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通览入选文稿，既有历史纵深的面上的梳理研究，又有点上的深入个案分析，既有正史和地方史志的运用，也有民间口述史和丰富田野资料的采纳，做到了点面结合，完整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伊斯兰与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的多维历史画卷。

明末清初以来兴起的云贵高原特殊环境中的西南地区回族马帮，与区域内

各兄弟民族的马帮一道，共同开拓、编织了联通西南与域外中南半岛地区的西南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网络，并一度成为其中的劲旅。值得怀念的是，这次学术研讨会，我们来自云贵高原的13位回族老中青学者结合的学术团队，被参会的香港本地和区域外学者们誉称为一支独特的“云贵高原的回族学术马帮”，从云贵高原一路南下来到香江之滨的维多利亚湾，为合作高校的师生及同仁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高原学术新风，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为我们今后的学术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会议圆满结束之际，根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首席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Professor David Faure）的建议，由我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本项目协调人马健雄博士共同主编会议文集，分别在中国内地和美国出版中英文本，以向中外学界同仁展示本次学术研讨会之成果，本书即是会议论文的中文本结集。

我们深信，本书的结集出版，对于读者从历史人类学角度认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构建中的贡献，了解云南回族跨境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历史及其现状，以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西南地区回族社会与东南亚地区历史联系中积淀的文化遗产之当代价值，古为今用，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最后，编者要衷心感谢云南大学出版社伍奇副总编辑等领导慷慨支持本书中文本的出版，并代表所有作者和会议主办方，谨向云南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在商品化大潮冲击下，不为孔方兄所主导，特立独行，孜孜以求，笃志向学，恪守大学出版社应有的学术品位，表达由衷之敬佩。

乙未年西历初夏6月6日于昆明北郊素菲斋
(作者：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目 录

前 言	姚继德
云南回族社群与东南亚的历史联系及当代变迁	姚继德 (1)
《滇缅边境邦隆回教百年沧桑见闻录》校注 [缅甸] 明光熙 编撰 姚继德 校注	(26)
泰国北部华人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变化	冯 瑜 [泰国] 合富强 (49)
清季咸同年大理社会变革的再认识 ——一个村落及家族史的视角	马存兆 (77)
失业矿工与地方军事化：清中期云南西部银矿业衰退与回民的族群动员	马健雄 (88)
熟悉的他者：云南“藏回”族群认同的自述与他述	李红春 (114)
多元文化生境中的互动与变迁 ——对大理腹地“白回”族群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赵卫东 (155)
回族社群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历史转向及其时代意义 ——滇南沙甸的个案研究	桂 榕 (189)
昆明穆斯林社群的变迁：1274—2000 年	马雪峰 (212)
变迁与重构：昆明市顺城街回族社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马寿荣 (225)
大理回族餐饮业调查	马志宏 (238)
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回族教育文化考略	刘 砾 (249)
试论乌蒙山区回族谱牒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马良灿 刘 砾 (268)

Contents

Introduction	<i>Jide YAO</i>
The Hui Communities in Yunnan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nec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i>Jide YAO</i> (1)
The Annotation of <i>The Records of Islam in Panglong on the Borderland between Yunnan and Burma</i> by Guangxi MING (Myanmar)	<i>Jide YAO</i> (26)
The Change of Identities of Chinese Muslim in the Northern Thailand	<i>Yu FENG & Fuaiang HE (Thailand)</i> (50)
Rethinking Social Changes from the 1850s to the 1870s in Dali Area: A Perspective of Family and Communal History	<i>Cunzhao MA</i> (78)
Unemployed Miners and Local Militarization: Ethnic Mobilization of the Hui during the Decline of the Silver Mining Industry since the Mid-Qing	<i>Jianxiong MA</i> (89)
The Familiar Other: Self-Narrative and Other-Narrative of the Tibetan-Hui Identity	<i>Hongchun LI</i> (116)
Social Change and Interaction in A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Bai-Hui in Dali Area	<i>Weidong ZHAO</i> (156)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Islamic Cultural Education of the Hui in Shadia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Rong GUI</i> (190)
The Social Change of Muslim Community in Kunming: 1274 – 2000	<i>Xuefeng MA</i> (213)
Social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the Hui Community on the Shuncheng Street in Kunming	<i>Shourong MA</i> (226)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Hui Restaurant Business in Dali Area	<i>Zhihong MA</i> (239)
The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Culture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Republic Era	<i>Li LIU</i> (250)
The Culture of Genealogy of the Hui in the Wumeng Mountains Area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Liangcan MA & Li LIU</i> (269)

云南回族社群与东南亚的历史联系 及当代变迁

姚继德

摘 要：中国西南端的云南省，在中国历史地理的视野中素称边徼，在中原文化的视野中亦属于化外蛮荒的“华夏边缘”。但在亚洲历史、文化和经济地理的大视野下，云南则具有举足轻重之独特地位。由古老的“蜀身毒道”发展演变而来的西南丝绸之路网络，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寮国）、越南、泰国与柬埔寨五国之间，架起了经济交流、民族迁徙、宗教交融、外交通使等的文化走廊，使得云南在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构筑起了一个以马帮为载体的“马帮文化圈”。明清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前，云南回族长途跨国马帮兴起，凭借穆斯林自身的宗教信仰与崇尚商业之传统精神，长期主导着该文化圈的运作，在此过程中，分别形成了缅甸的“潘泰人”（Panthay 或曰“潘塞人”）和泰国北部的“秦和人”（Cin-Ho Muslim）两个云南回族境外派生族群或亚族群。这两个在缅、泰两国落地生根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又保持着与云南回族社会的民族认同的滇籍华人穆斯林后裔社群的存在，使得云南回族社群与泰缅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持续至今，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考察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社群网络及其历史演变的重要样本。本文根据笔者长期的实地田野调查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人类学的宏观角度，论述历史上云南回族社群与东南亚社会的这种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传统联系的恢复和发展状况，同时讨论其在未来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关系中可能的新角色。

关键词：云南回族社群 中南半岛 马帮文化圈 历史联系 当代变迁

绪 言

回族是云南省的25个世居民族之一，也是云南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跨境民

族之一,^① 其入滇历史至少在 700 年以上。回族在云南与中南半岛邻国之间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中介角色。在 700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云南回族发扬穆斯林善于经商的贸易传统,借助滥觞于“蜀身毒道”的西南丝绸之路交通网络,积极参与到了中国历代王朝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与文化事务中。元明两朝时期,西域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及其家族,沐英(1344—1392)及其家族作为回族政治精英的代表,曾相继以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和云南镇守使的封疆大吏身份,代表元、明两朝中央政府,长期执掌云南的内政和外交事务,或参与国家与中南半岛国家间的军事征讨,或参与国家对中南半岛地区的外交往来,在云南政治史和中国边疆治理中留下诸多的文治武功,名垂史册。^② 明清以降,云南回族更多的则是以从事跨国长途马帮商人的身份与东南亚邻国开展频繁的跨国商业贸易活动,并开始有零星的移民定居者。在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反清起义(1856—1873)失败后,滇西大理、保山一带无辜回民为逃避清政府的种族屠杀而跨境流亡缅甸佤邦班弄(Panglong),成为首批政治难民。1949年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因国共内战流亡金三角的原国民党残军中的回族军政人员,边界封锁后无法回国滞留在滇—缅—泰—老边境线上的大批回族马帮商人,以及为逃避大陆土地改革而逃入缅甸、泰国的回族地主商人等,他们先后构成了两波跨国境而居的第二批回族政治难民。明清及近现代时期流寓缅甸、泰国的这些回族马帮商人及回族政治难民,共同构成了今天主要生活在缅甸和泰国北部的两大境外回族派生族群——潘泰人与秦和人。^③

① 所谓“世居民族”,按照中国官方和民族学界的界定,必须是定居时间在三百年及以上,人口超过 5 000 人的族群。而“跨境(或跨界、跨国)民族”的界定学术界尚存争议。目前中国官方及学界确定的云南省与邻国之间的跨境民族有 16 个:彝族、哈尼族、壮族、傣(泰)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瑶族、景颇(克钦人)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笔者以为,清代就已迁居缅甸和泰国北部且保持着与云南故里强烈的民族认同的回族后裔,也应该列入云南省的跨境民族之行列。

② 参见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李清升著《明黔宁王沐英传》,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参见马绍忠《阿瓦山班弄回族历史调查》,收《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33 页;A. D. W. Forbes: *The Cin-Ho (Yunnanese Chinese) Muslims of North Thailand*, JIMMA, Vol. 7, No. 1, January 1986; *The Panthay (Yunnanese Chinese) Muslims of Burma*, JIMMA, Vol. 7, No. 2, July 1986; *History of Panglong (1875—1900): Panthay (Yunnanese Chinese) Muslims Settlement in Burmese Wa State*, *The Muslim World*, Vol. 78, No. 1, 1988; 缅甸明光照编《滇缅边境邦隆回教百年沧桑见闻录》,缅甸眉苗:1992 年 10 月内部印本;姚继德《泰国北部的云南穆斯林——秦和人》,刊云南大学《思想战线》2002 年 6 月第 3 期;姚继德《云南回族移居缅甸小考》,收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2 辑,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本文拟从云南与中南半岛间的交通网络,云南回族社群的分布及其特点,云南回族社群与东南亚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中南半岛的回族派生族群:潘泰人与秦和人,云南回族与东南亚社会关系的当代变迁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云南回族社群历史上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政治、商贸、迁徙及文化交流之关系。

云南与中南半岛间的交通网络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在中国古代人文地理中属于“西南夷”的范畴,从中原历史地理的角度观之,向为化外蛮夷之地,属于典型的“华夏边缘”区域。^①但从亚洲历史、文化和经济地理角度来看,云南则处在南亚、东南亚与中原内地交汇的黄金地带。云南与中南半岛的缅甸、老挝、越南三国陆地接壤,边界线长达4 061公里,与泰国、柬埔寨地理上比较接近,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为近邻,从云南西部怒江峡谷顶端的贡山边界前往印度东端的阿萨姆邦(Assam),直线距离仅有150公里左右。^②由于山水相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许多民族跨境而居,彼此之间有着地理、民族和宗教上的亲缘关系,自古以来就发生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人类社会的文明历史业已证明,任何民族或族群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必须仰赖于存在某种通畅的交通孔道,这是民族或族群文化发生接触的首要前提。有了交通的渠道,才有文化的接触;有了文化的接触,而后方有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公元前四世纪即已存在的“蜀身毒道”,正是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古代各民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交通大动脉。“蜀身毒道”的起点为蜀地四川成都平原,最初终点在南亚“身毒”(India,天竺,即今印度),故以其起始点而命名之。它的存在,使得云南自秦汉时期开始,就充当着中原内地与南亚次大陆“身毒”(印度)、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东南亚中南半岛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迁徙和外交往来的前沿。据文献和考古发掘证明,“蜀身毒道”的开通时间早于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时开通的北方丝绸之路,^③它由四条干道构成: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和身毒(缅甸)道。参见图1。

① “华夏边缘”概念,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明珂博士在其论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提出的,对于我们解读中国古代华夏集群与周遭的蛮、戎、夷、狄等族群的历史关系,有极佳的启示。

② 参见《云南省情》,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云南与中南半岛三国边界线里程分别为:滇缅边界线有1 997公里,滇老边界线有710公里,滇越边界线有1 353公里,云南全省共有27个县位于边界线上。

③ 中国历史文献中对“蜀身毒道”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对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条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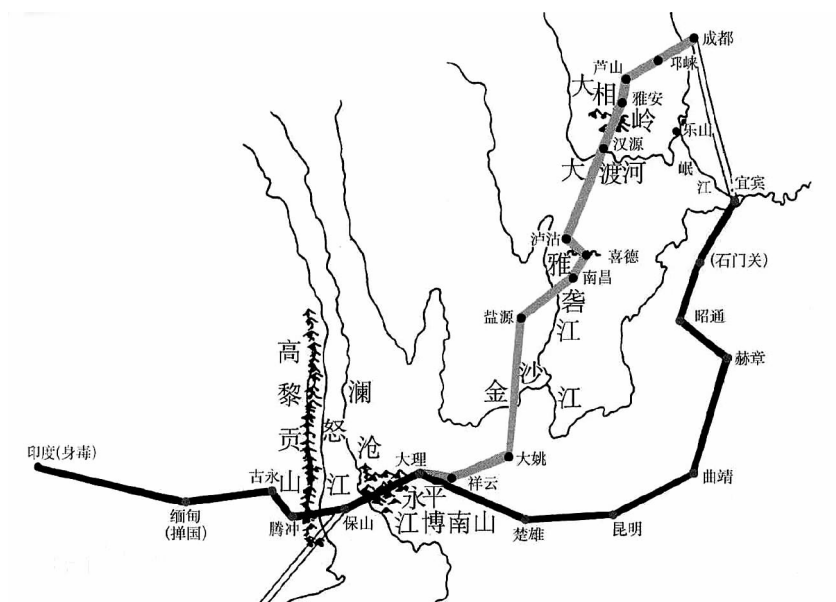


图1 蜀身毒路线图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picture/3028214>.

灵关道：北起成都平原，经临邛（邛崃）、灵关（芦山）、青衣（雅安）、笮都（汉源）、邛都（西昌）、青蛉（大姚）、云南（祥云）抵达叶榆（大理），与五尺道汇合。该路线属于中原经四川入滇的西线，又称“西夷道”。

五尺道：北起成都平原，经蕃道（宜宾）、石门关（盐津）、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滇（昆明）、安宁、威楚（楚雄）、云南（祥云）到叶榆（大理）。因沿途翻越乌蒙山脉，山高谷深，岷江、金沙江、牛栏江横亘其间，河流湍急，途程漫漫，只能开凿出五尺宽的路面，故名五尺道。该路线属于中原经四川入滇的东线，又称“东夷道”。

永昌道：灵关道与五尺道在大理汇合之后，翻越点苍山脉和博南山，一路向西进入永昌古郡地域，故称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后经博南山（永平）抵达汉代故郡永昌（保山），从永昌经蒲缥翻越高黎贡山到达滇越（腾冲），从腾冲边界的古永进入掸国（缅甸）。该路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与中国之间开辟的著名的滇缅公路中滇西路段的基础。

身毒道：永昌道从其辖区内的边地腾冲出境进入缅甸，再由缅甸通往身毒（印度），学术界也称之为缅印道。^① 其路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通的史

^① 参见陆初著《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5页。

迪威公路（滇印公路）。该道在印度可转道西亚波斯（伊朗）和阿拉伯半岛，最终通往大秦（罗马帝国）。

秦汉迄至唐宋时期里，由于“蜀身毒道”这条国际交通网络的有效运行，使得南诏、大理国首府大理古城的威名远播，据世界古代城市史的专家考证后认为，大理城早在千余年前就曾跻身世界当时的14大著名城市之行列。^①

唐宋时期的南诏（738—902）、大理国（937—1253）时期，凭借着这个与域外便捷的国际交通网络，云南与上述地区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仍。与此同时，在秦汉魏晋时期“蜀身毒道”的交通网络基础上，云南各族人民与上述区域内的各国人民一道，逐渐开拓出了西南丝绸之路网络中通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通渠道。主要干道有：云南通往越南北部的交趾道，从滇西德宏地区进入缅甸的瘴疠道，从滇南西双版纳景洪进入缅甸、老挝抵达泰国北部的车里道，由滇南文山地区进入广西通往海外的邕州道，从滇西地区通往南亚印度的天竺道，从滇南茶叶主产地临沧、普洱经大理、丽江通往迪庆藏区、西藏、尼泊尔和印度北部的茶马道等几条交通路线。^②

元代随着云南行省的建立，蒙古统治者在原南诏、大理国疆域内设置了大量通往中南半岛周边邻国的交通站赤，对外交通极其发达。据《元史·站赤》《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等史书的记载，元朝时期，云南行省在南诏、大理国对外交通线的基础上，与中南半岛的缅甸（缅甸）、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老挝和八百媳妇（泰国北部）诸国之间，普遍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官方驿站，为维护元王朝与这些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往来，奠定了坚实交通基础。^③ 元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七年（1280—1290）间，当时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曾奉旨经由云南出使缅甸、班加刺（孟加拉）公干，他从元大都一路南来经过的就是西南丝绸之路，其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留下诸多记录，盛赞云南行省与域外交通之便利。^④ 此外，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天堂》条中记载说，云

① 参见昆明《春城晚报》记者王明达对在大理举办的“世界城市发展史国际研讨会”的报道：《世界城市发展史研究成果表明——千年前大理曾跻身全球大城市之列》，刊2000年5月5日头版。

② 参见唐丞相贾耽《皇华四达记》，收《新唐书·地理志》内，有“安南通天竺道”，安南唐时为都护府，紧邻南诏界。宋人周去非撰《岭外代答》卷二：安南国、蒲甘国；卷三：西南夷；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等条，以及前引陆韧著《云南对外交通史》第二章。

③ 参见方铁《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刊云南大学《思想战线》1987年第3期；方铁：《元代云南站赤设置考》，文收《史学论丛》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参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17至126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南有路可以直达西亚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城（天堂国）。^① 这条通道的存在，被明初七下西洋的云南昆阳籍回族航海家郑和为其父亲——元代世袭滇阳侯（封地在今滇池南岸昆阳一带）马哈只所立的《故马公哈只铭》碑所证明。^② 因此，元朝时期的云南对外交通网络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秦汉、魏晋和唐宋诸朝，可以顺畅地抵达西亚波斯和阿拉伯半岛，并与蒙古帝国在南亚、西亚、中亚、北非和欧洲建立起来的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统治区域连为一体。

明清时期（1368—1911），在元代站赤交通网络的基础上，云南的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得到了拓展和完善。与此同时，该时期云南各民族跨国长途马帮贸易的勃然兴起，促使云南与域外邻国的国际交通得到空前的繁荣，西南丝绸之路网络的功能在马帮商贸活动的带动下，发生着一系列的转化，整个西南丝绸之路网络结构更趋完善，形成了多条支线和商贸循环圈。笔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将明清以后的西南丝绸之路网络结构，以主导其运行的马帮商贸活动为标识，归纳为以下四个马帮商贸网络。

◆**茶马古道网络圈**：东起滇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临沧，西经大理、丽江、迪庆进入西藏的“茶马古道”。该道还循环于滇—藏—川西—尼泊尔—印度—缅甸之间，构成了一个以藏族马帮为主，兼有纳西族、白族和回族马帮参与，以藏马交易滇茶的“茶马互市”为主要交易方式的“茶马古道”交易网络。

◆**滇—黔—桂—越马帮商贸网络圈**：北起滇中昆明、玉溪，滇南个旧、蒙自、建水，滇东北曲靖、昭通，进入贵州、广西、越南的“交趾道”，该道在汉唐时期的“安南通交趾道”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循环于滇南—广西—越南之间的独立马帮交易网络。

◆**滇南—缅—老—泰马帮商贸网络圈**：由滇中、滇西经滇南思茅（今普洱市）、车里（今西双版纳景洪市）进入老挝、缅甸掸邦东部和八百媳妇（泰国北部清迈、清莱一带）的车里通景迈（今泰国清迈）道，形成了循环于滇南—缅—老—泰四国之间的马帮交易网络。

◆**滇西—缅—印马帮商贸网络圈**：由永昌以远及缅甸境内的古道，则由天竺道和瘴疠道构成：天竺道由永昌西行过腾越，出国境后经金宝城（今密支那）至安西（孟拱），亦称孟拱道或蒙光道，西行达于身毒，是为天竺道；瘴

① 元人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325页“天堂”条谓：“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

② 据明初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郑和返乡祭祖所立《故马公哈只铭》记载：其祖父和父亲两代均为朝觐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Mecca）的“哈只”（Hajji），他们赴麦加朝觐的时间都在元朝时期。该碑现存郑和故里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镇月山郑和父亲陵墓原址，得到较好保护。

病道由永昌西行经茫部（今芒市）、畹町、乐城（今瑞丽），出国境至缅甸腊戍，抵下缅甸，再由仰光港泛海转身毒、大秦（罗马），此道因沿途瘴疠肆虐，故以名之。^① 瘴疠道即后来的滇缅公路保山至德宏州境内畹町口岸进入缅甸后的腊戍段。这两条起源于滇西，分别向南和向西南展开，但又在缅甸境内交汇的商贸通道，形成了滇西—缅—印马帮商贸网络圈。

这四大马帮商贸网络圈的结构，见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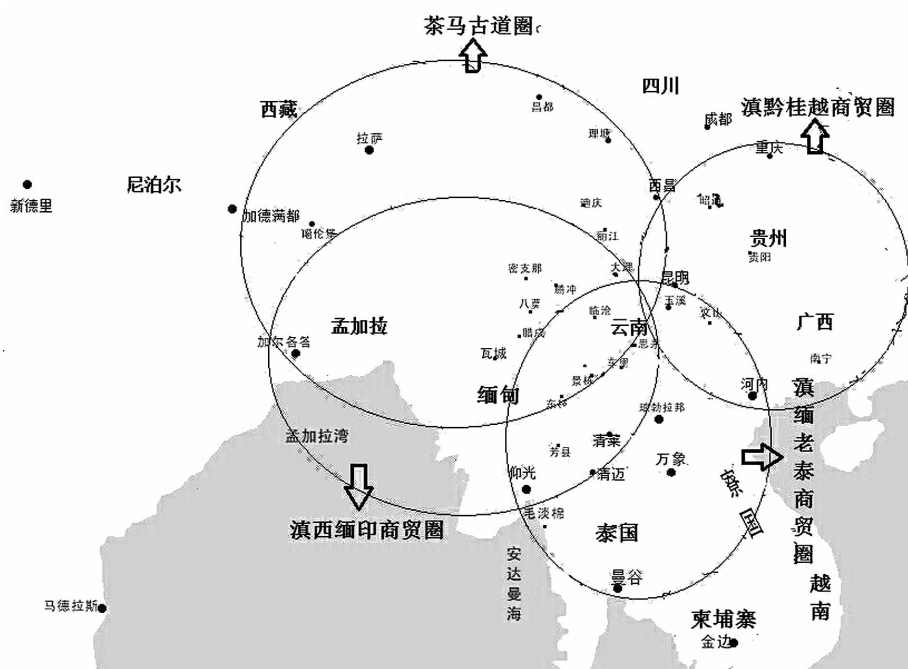


图2 西南丝绸之路四大马帮网络圈结构示意图（制图：陈文妍）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Silk Road）一名，系由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赫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最早命名，即被广泛接受。“丝绸之路”中的“丝绸”一词，已经不是中外商业史上流通商品“丝绸”的狭义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Cultural Symbol）。丝绸之路由西南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大网络构成，丝路上流通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香药、茶叶等主要中外商品，还传播着佛教、景教、祆教、伊斯兰教，还发生着古代各大帝国之间的战争，发生着西方殖民帝国对东方的

① 参见郭来喜《联结中原与南亚的西南古道》，刊台北《大地地理杂志》1990年10月号。